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关切 及其实践逻辑

王鑫 袁祖社

摘要 在后全球化时代,日益严峻并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立足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秉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伦理价值信念,理智对待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层次上寻求人与自然并生、互适、共在的新范式。标志着生态文明新境界的“地球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困境、维护全球正义的生态伦理新理念和生态治理新模式。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制定并践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引领性的智识性实践方案,如遵循天地美生的绿色发展,倡导“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

关键词 命运共同体;生态危机;价值关切;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B018;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3)02-009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JJD710001)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自始至终面临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性生态退化、水土流失、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骤减、瘟疫频发等问题日渐凸显,这不仅预示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表明人类共同守护和构建地球家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身处后全球化时代,文明人类能否建构一种更具基础性、系统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样态,以寻找、确定一个使人与自然共处一体成为可能的伦理方案和相应的可预期的美好生活图景,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且紧迫的任务。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1](P36)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命共同体理念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命题以及人类有效集体行动的基本方略之一。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命运共同体等生态文明新理念,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享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2]。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3](P23)这不仅昭示了生

命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困境、重塑国际生态新秩序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也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人类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行动指南,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思考这一问题,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需要探寻、澄明生命共同体概念、命题的哲学基础,反思其合理的价值关切,把握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现实路径。

一、“生命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工业文明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人类在满足自身扩张无度欲望的过程中,该如何理智对待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人类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从过去破坏地球转化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上来(从生存走向优存,从满足需要到克制欲望),从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层次上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范式,成为人类生存史上的一大难题。

生命共同体是现代社会实践主体对自身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理性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生态文明新理念和生态治理新模式。它具有以下属性:一是共生性,即指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使人与周围的一切生命体能够一道生存、一同生活。二是共享性,即人类在利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收获的生态利益,应该由人类共同享有。因为环境资源是人类共同的公共财富,由环境资源带来的利益和发展成果也应该共同分享,不断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三是公平性,即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要尊重、保护地球一切生命体的生存权利;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履行与之对等的生态保护义务,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责任。四是可持续性,主要强调的是人类想要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就要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考虑到自然的生态阈值,将自身的实践行为控制在自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倡导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自然生态系统能够休养生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继续发展的空间。

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有效地吸收了西方共同体理念合理的思想精华,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

首先,生命共同体汇聚了启蒙现代性以来西方关于共同体理念的思想精华。共同体起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的是社会中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团体、组织。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缔造者之一、20世纪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对传统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中指出,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4](P54)。这就是说共同体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空间维度的实体,更是由内在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精神联合体。而社会则缺乏一种内在情感和精神纽带的连接,只是由外在秩序规制的结果。正是由于共同体具有这样的特征,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还将共同体视为一种对家园的新理解,他指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温暖我们的手”^[5](P2),“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5](P3)。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能够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带来温暖和舒适的寓所。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共同体的理解和诠释主要聚焦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更基础、更深层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生物学家利奥波德基于生态伦理、生态美学,全面审视并深刻理解、精到诠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性关系,成为生态整体主义的奠基者。利奥波德敏锐地洞察到工业革命、现代化实践中人类盲目逐利活动对自然界的侵蚀,其所著的《沙乡年鉴》被誉为“环境主义运动的圣经”;他提出的“像山一样思考”的口号成为那个时代生态运动的核心理念和指引。依利奥波德之见,土地不仅仅是土壤,而且是能量的源泉之一,与人类是共生性关系,“它暗含

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6](P194)。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伦理学是以人为核心的狭隘的主体性伦理学,而大地伦理学则将伦理道德的关怀视域延伸至其他生命范畴。以此为据,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共同体概念。大地共同体主张各成员就像人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一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每个人都有维护共同体的良心和义务;判断个体行为对错、确实与否的伦理标准,是否“有利于土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6](P212);自然环境保护的涵义是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存。罗尔斯顿吸收了利奥波德大地共同体思想的精华,肯定了自然的内在性价值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共同体概念:“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并非不好的意义上的‘荒野’,也不是‘堕落’的,更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她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7](P10)

其次,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化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回答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生、现实表现、社会实质以及未来走向。启蒙现代性以及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出于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逐利的本性,依靠技术,将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纳入人的理论和实践对象。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8](P161)自然失去了神秘,人类没有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不断地把“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在征服、占有自然中成为主宰和主人,生态危机的频繁暴发向自傲自大的人类发出了警醒。恩格斯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9](P998)马克思立足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着生命共同体的基础性地位。生命共同体的存在,离不开人与自然共同体这一子系统的支撑。一方面,人与地球生命共同体交互作用的前提,是必须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优先性地位,“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0](P48)。另一方面,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对象,更是社会历史发展必不可少的有机内容。“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0](P86-87),“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0](P103)。不仅如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及其全部生命活动都要以自然为基础和前提:“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P161)依马克思恩格斯之见,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所在,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就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理想,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P928-929)。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最后,生命共同体根植并有效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在中国古人看来,万物始于天,生于地,人在天地之间与自然比邻而居,折射出中国古人最初睿智质朴的生命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理性智慧和识见,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论的孕育、提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其中的精华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考察人与自然的共生性的论述,譬如《论语·阳货》有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2](P698)。二是对人与自然万物息息相通、自然山水与人类情感灵动共鸣的体认,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3](P62)的论述。三是遵循自然变化规律合理安排人类的生产生活,让自然休养生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可持续发展观,如《荀子·王制》的“草木荣华滋硕之

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14](P165),《论语·述而》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2](P276)。此外,天下为公、胸怀天下、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思想,都揭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感悟,蕴含着深远博大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至今仍熠熠生辉。

二、“生命共同体”对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价值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基于更根本的理论关切:“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霍金先生提出关于‘平等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实现是个未知数。到目前为止,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園,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是唯一选择。”^[15](P538)现实的情境是,人类沉溺、满足于改造自然的成就之中,放弃了呵护、保护自然万物和生态的责任和义务,受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的驱使,变本加厉地对自然生态实施疯狂的掠夺和虐待,致使自然界满目疮痍、不堪重负:“人人仰望天空皆见:生态危机。地球已达其能承受人类过度消费和浪费的极限。现在,所有自然之物都因其受到虐待而在痛苦中呻吟。”^[16](P6)显然,人类过往既有的经验提醒我们,人与自然的共同体生存情景之所以遭遇持续的威胁和解构,与启蒙现代性以来对基于自由个人主义信念的资本逻辑、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盲目推崇密不可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促使作为人类命运根基的人与自然的生态整体性分崩离析。对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关切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现时代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界的關係,明确人类在地球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进而重构一种可以使人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共同体样态。

生命共同体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关于自身的生存整体性与实践主体性内在有机统一的价值自觉,是一种合理形态的新质共同体演进的鲜明标志,其所依循的是共生、共在、共创、共享的人类公共性生存的价值信念,具备了从根本上超越以往旧的共同体形式的一切要素,开显出人类整体性优存的新境界。鉴于此,生命共同体对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价值关切,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培育全人类休戚相关、祸福相依的整体生态命运观。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命安全不断地遭受着各种形式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自然原因引发的自然灾害,二是人类不恰当的生存生活方式引发的人灾。生态危机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僭越行为触犯了大自然的底线,违背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使人类社会陷入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诠释的风险社会的生存场域。依贝克之见,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制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正充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态环境被破坏作为人为制造的最大的风险灾难,正从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挑战人类生存的底线,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且对人类本身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在生命共同体的视域下,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是同一个安全。生命共同体正是由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整体性安全决定的共同体形式。

当今世界的风险还表现出另一个特征,即“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与再生产,跨越了国界。在这个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17](P7)。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作者曾犀利地指出:“民族国家的边界正一天天被越来越多的各种交流渗过,……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18](P138)新冠疫情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健康问题,它同时关联着生态问题、人的生存生产方式和价值思维模式,关联着人类整体的生命安全。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往往都是后知后觉的,新冠疫情的暴发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越发认识到全人类是一个休戚相关、祸福相依的共同体,任何自我封闭、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必须树立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整体主义价值观。这正是生命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生命共同体还意味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健康安全信念,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

命运共同体强调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在对抗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秉持生命共同体的价值信念,表现出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伦理情怀,彰显了人类对整体性安全的责任担当和共同价值诉求。

其二,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202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和破坏大自然。报告强调,1970年以来,动物的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68%,地球上75%的无冰土地已经被人类活动显著改变。自从1700年以来,全球近90%的湿地已经消失。WWF首席执行官Tanya Steele说,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世界——一个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地方——危及我们在地球上的健康、安全和生存。地球的“生命之网”遭受破坏使人类处于极大的生态危机之中,而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启一个协同合作的新时代,因为人与人之间只有协同合作,结成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才能共同对抗生态危机的威胁。命运共同体意味着相互依赖的个体或群体朝合作模式之个体或群体进化的趋向。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一场生态启蒙,启蒙的真谛就是“学会在一起”的生存智慧,即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将人们观念中原本的“你”与“我”的对立关系转化成“我们”的共同体关系。这预示着生命共同体的建构将使人们抛弃以往的矛盾分殊,怀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伦理情怀,促使人们学会关心、学会尊重、学会欣赏、学会合作,走向相互依赖、联合与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共同呵护地球生态家园。

其三,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维护全球生态正义,实现生态财富、生态福利和社会财富的共享。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所有生态问题均根植于社会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分殊最终往往都转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为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和国家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居主导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必然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遭遇不幸。当今时代,国际社会将业已存在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现象延伸到了生态领域,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欠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进行资源剥削和掠夺,如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向欠发达国家倾倒垃圾、填埋废物、输出有害废料,把欠发达国家当作工业加工厂和垃圾场,将有损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重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却对他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等等。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戴维·哈维说过,资本主义“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19](P421)。

生态帝国主义制造了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不仅给欠发达国家造成了生态灾难,最终也使自身陷入生存困境。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尽管基于民族国家利益本位的生态保护工程短期内保护了本国的生态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却难以摆脱全球性生态恶化的影响,“美国排污酿成的酸雨会让加拿大的湖泊遭殃;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泄露会污染远在北欧拉普兰的牛奶;用于在新英格兰地区或佛罗里达州发电的铀会给铀矿所在的西南地区土著美国人的土地留下致命的矿渣”^[20](P112)。以上我们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大自然是一个有机循环系统,地域性的生态问题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全球的生态变化。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全球正义问题联系起来,对世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问题进行现实的、自觉的反思,解决生态帝国主义、生态剥削以及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然资源与财富分配的合理化,以此为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共享创造有利的条件。

命运共同体主张的生态公正性伦理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代内公平,指的是同一代人不论国界、种族、性别、经济水平和文化差异,在要求良好生存环境、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风险分配等方面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代际公平,也可以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资源分配思想,强调的是不同代际公平使用自然资源,人类应该将自身的发展和实践控制在自然可承受的阈值之内,以便既能满足当代人的生产生活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有自然资源的机会和权利。这一理念的最早倡导者、美国学者爱迪·B·维丝说:“我们,人类,与人类所有成员,上代人,这代人和下一代,共同掌管着被认为是地球的我们的行星的自然资源。作为这一代成员,我们受托为下一代掌管地球,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受益人,有权使

用并受益于地球”^[21]。三是种际公平,如前面所述,自然界中各个要素与人之间是休戚相关、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使整个地球充满生机与活力。但是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作为高等生物拥有其他生命体不具备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可以利用知识科技等手段创造有益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有利条件,因而人又是维护地球生态正义、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主导力量,有责任尊重地球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以平等、敬畏之心承担起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公正秩序的责任与义务。

三、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上已述及,自然—生态是个有机的统一体,“生命和物质世界并非存在于‘孤立地隔间’之中,相反,‘在有机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统一体’”^[22](P19)。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共同体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范式,生命共同体立足生态整体性视野对自身、对象世界以及自我的关系作出一种全面深刻的审视,自觉矫正以往西方现代性对资本逻辑、技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利益本位价值观的偏执,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定位生存的坐标,重新反思人类自身的位置,重新规划人类未来的发展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雪上加霜。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3]进入文明转型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的建构和形成,除了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共生、共在、共创、共享的人类整体性优存的价值共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一种新的文明理念、方案转化为人类有效的集体行动逻辑。在这方面,人类也曾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和尝试。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即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提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理念。设立“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社会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而采取的重要行动。近年来,全球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并没有完全遏制。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军事冲突、科技变革等一系列复杂变量正发生深刻变化,环境保护面临着更尖锐、更严峻的新挑战,探寻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新思路、新方法的紧迫性意义日渐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环境保护运动,然而,至今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根源在于缺少一个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至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顶层设计。以此为鉴,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对地球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和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是在人、自然与共同体良性共生的关系格局中,实现并践履一种包容、共享、和谐、可持续的优良制度实践,让全人类看到了一个有着关于未来之确定性承诺的文明性共存的曙光。

首先就现代社会发展方式而言,生命共同体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业文明以来,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奉行的黑色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法抚平的梦魇,给自然环境造成难以磨灭的伤痕。高消耗、高污染的黑色发展信奉物欲至上的价值理念,遵循越多越好的发展原则,催动经济理性奋勇前行。这种发展方式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原有平衡与稳定,使天地美生的人间至美境界化为虚幻的泡影,造成人与自然、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深度疏离。由此,基于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地对以往社会中非生态和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加以合理化规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23]。

立足人类普遍福祉最大化的公共性生存信念,如果依然秉持以往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

规制的发展模式,势必难以应对生态危机的浩劫。作为一种实践层面的对策,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生存信念和规范,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绿色发展,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3](P49-50),“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4]。显然,绿色发展关涉、关切的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既寻求有利于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也要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使自然生态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坚实后盾,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不仅如此,绿色发展还倡导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一方面强调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工业活动对人类和环境影响的风险,如使用清洁能源、推崇无公害的绿色工艺等;另一方面,倡导一种低碳环保、节约适度的新的生活方式,如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因而,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只有通过践行绿色发展方式,人与自然才能真正形成共生共在的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一个普遍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其次就现代社会治理机制而言,命运共同体倡导“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工程。后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普遍的生态危机,已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然而当今世界,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的纷争,各主权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始终存在着某些根深蒂固的对抗、冲突和分裂,难以达成一致性和解。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国际生态合作,使全球生态治理的政治联盟变得相当困难,而且还造成国际社会的生态治理多处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困境。在新的时代视域中,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蔓延将人类的生态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类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只有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建立“国内—国际”协作治理机制,才能增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共创一个万物和谐美丽的世界。

地球命运共同体之更为现实的指向,在于强调人类整体性生存实践中以团结合作、互利共赢为基础的生态治理逻辑。习近平指出,“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应对挑战、合作开创未来”^[2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立足国际视野,多次提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新规划人类合作性、集体性行动方案,“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工程离不开以下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多边合作,努力推动全球协同治理的态势。这意味着世界各主权国家必须将生态命运休戚与共的思维注入国际生态合作之中,开展多方对话和交流,共同制定符合全球生态利益的国际生态治理规划体系。与此同时,各国也要针对自身国情提出因地制宜的生态治理方案和绿色发展规划。二是倡导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各类社会组织相互协调、共同作用,形成全球生态治理新秩序。随着生态危机的蔓延,国际社会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然而,由于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实践中往往受制于法律制度滞后、政府职能转化不到位、信息不对等因素,使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有逐步完善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才能建立起良性、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新秩序。这同时也是在实践中遵循和践行生命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最后就国际社会和人类所描绘的美丽新世界的愿景而言,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历史担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不断深入,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然而,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全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共

识以及人类集体的有效行动。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为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有机性和内在关联性。上述问题的存在意味着,倘若现代制度实践无法摆脱以往旧的对资本逻辑、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共同体价值规制和观念,不论其在理论上诉诸怎样自洽的逻辑,在现实层面都势必会在制度与资本的合谋中沦为控制、对抗自然的手段和工具,难以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化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地球生命共同体基于广义的“生命—生态—生存”三位一体的生命价值关切,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并生共在的生存伦理,是在后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性价值自觉基础上一种新的文明和制度性实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生命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关于人类较高层次、较高质量优存模式的理念设计、实践行动和制度性纲领,是对于美好生活、美丽新世界的价值期许,其所崇尚和倡导的是生存相依、实践协同、价值共契、成果共享的新质共同体的价值生存信念。但是在由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主导的现代世界,在合理阐明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据基础上,并为这种理念创造切实有效的条件和制度保障,则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挑战性的难题。从文明新形态的创制和实践探索的高度来看,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从更深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理念、范式、逻辑、目标等)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一种更具现实人道主义关切的伟大实践。这一长远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目标,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共性之人间正道的优秀品质和超越性境界,是对以往不合理的发展观的范式变革,是全球社会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信念,也是倡导一种全球一家的人类共同福祉至上的新的价值共识与文明新境界,为整个人类持续的繁荣昌盛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希望。

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有效应对并逐渐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需要生命共同体出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繁荣与发展,更离不开生命共同体理想价值的守护。毋庸置疑,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对有效化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保存人类文明的根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无论从人类历史还是当今全球化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人民利益本位以及民生福祉最大化的根本体现,是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格和提高人类生存新境界的完美体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05-05.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5]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6]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7] 霍尔姆斯·罗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3] 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4]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6] 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7]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8]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9] 戴维·哈维.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胡大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0] 丹尼尔·A. 科尔曼. 生态政治: 建设一个绿色社会. 梅俊杰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 [21] S. R. 乔德赫瑞, 黄列. 与代之间的公平: 可持续发展权基础. 外国法译评, 1998, (3).
- [2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 刘仁胜、肖峰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3]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21-04-23.
- [24] 习近平.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求是, 2022, (11).
- [25]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 2022-04-22.

Value Concer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onstructing Life Community on Earth

Wang X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Yuan Zush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post-globalization era, the spread of increasingly severe and intensify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has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key to solve this dilemma lies in that we should base on the organic integrity of ecological system and uphold the coexistence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self, while all things and self are one. The new paradigm of seeking the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t a higher level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mark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eal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earth life community, which is proposed by China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to deal with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 new concept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a new model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centered on protecting people's lives and safeguarding global justice. China has played a key leading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life on earth,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forward-looking policies. The leading practical plan of intellectual knowledge, such as follow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heaven and earth, advocat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oject, fully reflects China's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feelings for the world, demonstrating China'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s a participant, contributor and lead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life; ecological crisis; value concern; practical logic

■ 收稿日期 2022-02-18

■ 作者简介 王 鑫, 哲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91; 袁祖社, 哲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哲学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陕西 西安 710119。

■ 责任编辑 涂文迁